

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传统民居门饰文化研究

李超, 谢亚平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 门是建筑物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仅体现在形制、色彩、装饰等物质形态, 还折射出民俗、信仰、风水等文化观念。在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下, 运用文化区理论、文化景观等理论对传统民居门饰文化进行研究, 通过对晋中地区、徽州地区、西南地区尚存的传统民居进行实地调研, 发掘传统民居门饰的地域特征, 尝试分析具有动态特征的门饰文化景观, 从而完善对传统民居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门饰; 传统; 民居; 文化

中图分类号: TU 241.5; TU-8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2-0066-08

一、传统民居研究的文化地理学启示

以往对于传统民居门饰文化的研究, 多倾向于从建筑学、民俗学、美术学等单一的角度进行静态的研究, 其结果是侧重于分析门饰的形态、装饰等物质形式, 未能够从宏观、动态的角度进行文化系统的分析。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 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地理学者索尔提出。文化地理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 研究范围包括语言、种族、宗教、民俗、物质文化、艺术等, 研究目的在于探寻“文化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的”^{[1]3}。以文化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传统民居, 是对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结合, 也是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在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下, 传统民居门饰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空间中“可定位的具体现象”。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可以将民居研究扩展为广义的“人—文化—环境”关系的研究。因此, 其研究重点不局限于门饰的物质形式, 而是重点在于探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空间差异与时间演变之间的关系。将传统民居门饰文化放入地域空间中进行研究, 其意义在于研究门饰文

化的地理分布、形成及发展规律, 并思考文化是如何引导、控制人类的民居营建活动的。

二、门庭各异——地域文化的类型解析

中国地理环境差异大、民族众多,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建筑文化区域, 如北方文化区域、江南文化区域、岭南文化区域、西南文化区域等。门饰文化以不同类型的建筑为载体, 形成于特定的自然物质空间中, 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形态特征。

选取山西、安徽、四川、云南四地的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 以期梳理传统民居门饰文化的发展规律。山西民居是北方民居的代表, 与徽州、西南地区的民居呈现出南北两派不同的文化气质。然而, 即使同处西南地区, 云南白族民居门饰也呈现出与四川汉族民居门饰不尽相同的民族风格。虽然各地的民居具有各自的发展脉络, 但在文化的交流与扩散中, 不同地域又呈现出某些统一性的特征。

1. 传统民居门饰文化中心区——山西

华北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心, 中国传统民居文化的形成也是以华北地区为中心而扩散到其他地区, 从而形成具有整合性的中国传统木构架

收稿日期: 2016-12-17

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传统村落营建工艺传承、保护与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2014BAL06B04)

作者简介: 李超(1992-), 女,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 谢亚平(1980-), 女, 四川美术学院手工艺学院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E-mail: 1019106161@qq.com

民居形式。山西民居则是这一文化中心的代表，其门饰文化因人口流动而迁移到其他地区，尤以晋中地区为代表。自明清以来，晋中地区商业繁荣，一度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商人致富后大兴土木，晋中民居因而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在山西传统民居中独树一帜。不像北京地区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约束，晋中一带的传统民居在形制、色彩、装饰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1) 木构垂花门。晋中地区民居的大门和中门以垂花门居多，古代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指的即是垂花门。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

立柱之外有悬梁挑出，梁头有木柱，但柱不落地，悬于半空中，由梁的后尾压挑，柱下端加以木雕化石，形如垂花”^{[2]11}，故而得名“垂花门”。一尺多长的檐柱垂吊于屋檐下，其柱头多为圆形的吊瓜形状或莲花形状，因此被称为“垂花柱”或“垂花莲”（图1）。与北京地区装饰艳丽的垂花门不同，晋中地区的垂花门以青、绿等冷色调为主，木雕图案以植物纹居多，如“岁寒三友”、“玉棠富贵”等。精致的雕花与沉稳的色彩是晋中民居富丽而质朴的风格的表现。



图1 不同样式的垂花

(2) 单坡顶门楼。晋中地区的大门造型各异，但大部分都是单坡顶的门楼形式（图2），形成“屋顶半边盖”的特色。单坡屋顶形式简单、外观朴素，在古代一般被用于贫民建筑，而在经济发达的晋中地区，这种屋顶却很常见。是因为，山西地区干燥少雨，常伴有大风沙尘天气。“采用向里倾斜的单坡屋面，坡顶背后的高墙对准院内，形成高大的墙体，使得院落更具封闭性，正好可以防风。而且北方民居多为抬梁式木构架，单坡顶的房子，比较容易选择架梁的木料，不需要又粗又长的大木料。”^{[3]70}此外，晋中地区气候干燥，单坡顶的屋顶可以将雨水聚集在院落中，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无论是从节约资源的角度，还是从适应气候的角度，单坡顶都是古代生态伦理自然观的体现。另外，从风水理论上讲，单坡顶还可以积聚财气。

(3) 抛物线拱券门。晋中地区烧砖技术发达，砖砌窑洞被运用于传统木构架建筑中，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砖木混合结构体系。平遥民居正房盛行“锢窑”，即在地面上筑成窑洞，但券型依然



图2 山西省平遥古城单坡顶门楼

保持抛物线轮廓^{[4]73}。不仅屋门采用抛物线拱券形式，这轮廓也反映到大门的造型上。采用抛物线拱券的民居大门，既符合力学原理，也顺应自然生态。同时，抛物线拱券与门扇、门檐还形成曲与直的对比，具有统一而丰富的节奏对比效果（图3）。



图3 山西省乔家大院抛物线拱券门

2. 传统民居门饰文化的扩散

传统民居门饰文化的变迁,除了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关外,还与外来群体文化的传播有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方的中原文化向南方扩散。以安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四川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区,以及云南为代表的云贵高原文化区等,其民居门饰都明显受到北方汉文化的影响。在文化的扩散中,各地以本土自然人文环境为内核,通过模仿、吸收汉族民居之门的营建技术、装饰题材、审美情趣等,形成各具特色的门饰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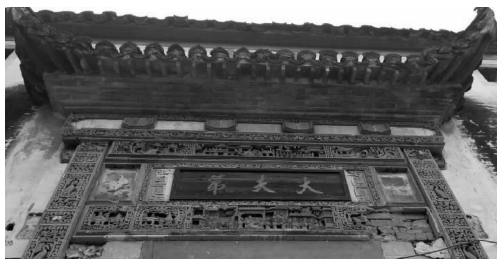


图4 李坑村口镇的李坑村砖雕门楼

(1) 徽州民居门饰。徽州民居历来重视大门的营造,有“十分建楼,七分建门”的说法。大门有字匾门、拱形门、垂花门、八字门等类型。门洞为立面墙面的 $1/15 \sim 1/20$,其尺寸与高大的墙体相比,显得较小。披檐式门罩随墙而设,上覆瓦片,可防止雨水随墙流入门洞内(图4)。徽州地区香山帮拥有精湛的雕刻技术,早在明代,其木雕技艺已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门罩之下,门脸之上的区域,便成为能工巧匠施展雕刻技艺的舞台。因此,徽州的砖雕门楼在全国独树一帜。门洞外多为青石门框,有的还以泾县花砖进行装饰,与白色墙面形成对比。门头上常有嵌方,多

书“大夫第、司马第”等匾额,形成具有江南文人气息的门饰文化。由于重装饰而不重尺寸,徽州民居门饰也以凭借装饰图案、技法的变化而呈现出“整体而富有变化”的特点。

(2) 巴蜀民居门饰。正如巴蜀人开放的性格,巴蜀地区传统民居门饰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形式。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川渝地区民居也受到较多外来移民文化影响,从而将南北两派建筑风格融汇于一体,门饰兼有江浙、闽粤、山陕、云贵地区的特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入侵,门饰开始呈现出西方风格。

①垂花门。受汉族文化影响,四川羌族地区也十分重视门的设计,故有“千斤的龙门”之说。稍微富裕的人家会将宅门设置成垂花门的样式,其构造与汉民居垂花门无大区别,一般为两层悬挑,四个木雕垂花柱。但也会做出因地制宜的改变。出于坚固、实用的原则,垂花门的尺度不如中原地区宽大。图5所示的垂花门位于理县桃坪羌寨,高3.6米、宽2米,其中垂花门头高1.5米、向外悬挑1.36米。羌族垂花门并没有采用“人字”形屋顶,而是从门柱向外单面悬挑,形成倾斜度较小的单面坡屋顶。羊在古羌人众多部落联盟中是氏族的标志,因此成为羌族造物设计的常用母体。很多民居门楣上常常雕刻有羊头纹样,反映出原始的图腾崇拜。门的两边挂上包谷、辣椒,摆放南瓜等,更增添羌族垂花门的民俗趣味。



图5 山西省丁村垂花门与四川理县羌寨垂花门

②八字龙门。川西地区的龙门最能代表成都平原传统建筑的特点,百姓所说的“摆龙门阵”由此而来。龙门通常是由一间人字形的屋宇构成,两楹屋架,悬山式屋面(图6)。门扇为板门,一般是放置在金柱上,檐口挑出,最外棵檐柱不落地,做成吊瓜状,落在向外伸出的挑枋上。一般

的龙门开间在 2.5 米左右,大一点的可达 3 米左右;板门的尺寸一般在 4 尺左右。龙门的左右一般为八字门墙^{[5]39}。墙上嵌照壁图案,也称“八字朝门”。这种宅门宽敞大气、防御性强,是大型庄园或大户人家宅门的常用形式。



图6 四川省成都市的龙门

③无厦门楼。无厦门楼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注重砖雕、泥塑和线条装饰。这种西式石砌宅门在宽窄巷子、锦里等历史文化保护区比较常见,一般是商贾富人的宅邸,显现了主人富裕的生活。成都市宽窄巷子中的民居是川西地区民居的代表,门头多采用青砖砌筑,门头两端设置有壁柱,部分门头顶部为木结构屋盖,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的融合。位于成都宽巷子11号的恺庐,其宅门由于风水的关系向西北歪斜(图7)。据说此宅主人留洋归来后,将自家的门头用特制的青砖砌成带有弧形凸起的拱形宅门,门洞上方悬挂传统石匾,匾上采用大篆阳刻“恺庐”,一反当时从右至左书写的惯例。石匾上方砌出椭圆形图案,代替传统“辟邪镜”以镇宅辟邪。



图7 四川省成都市的无厦门楼

(3) 云南白族民居门饰。云南省为少数民族聚居大省,各民族之间的门饰语言反映出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与民族信仰。而处于滇中地区的白族自唐代以来便受到南北两地汉族移民的影响,

因而白族民居大门则既显示出独特的民族个性,又兼具北方民居与徽派建筑的风格。白族民居大门多采用泥塑、木雕、彩画、石刻、砖砌等多种装饰技法,门楼上的飞檐、门楼下的斗拱,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综合体现。

①出角厦门楼。屋顶为歇山顶与庑殿顶,檐下梁枋上设有层层挑出的斗拱,屋檐两端翼角翘起,形成一个优美的屋面曲线。白族地区尤以“三滴水门楼”最为华丽恢弘,造价较高,常见于富家大户(图8)。三间牌楼式的门楼形成中间大两边小、中间高两边的立面造型。斗拱上木雕精巧,有的还在泥塑边框内绘以山水画或泥塑花饰,形成张弛有度、疏密有致的立体效果。



图8 云南省沙溪古镇的出角厦门楼



图9 云南省大理市巍山县的平头厦门楼

②平头厦门楼。屋顶为“一字式”硬山式,两侧翼角出挑简单,线条柔和,有单坡和双坡两种形式,又称“一滴水”(图9)。门楼少有精雕细刻的装饰和飞檐斗翘,而是用砖石作构件,在枋上镶大理石、以彩绘代替木雕,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三、亦术亦俗——传统民居门饰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理论认为:“人类会为满足某种需

要,有意识的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自己创造的成果,形成文化景观。”^{[6]28}因此,民居门饰文化景观是人的意识形态对自然景观改造的结果(图10)。而人的意识形态则通过风水、巫术、习俗等民俗文化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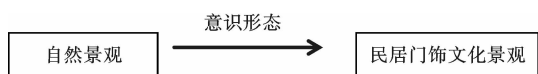


图10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关系

1. 风水堪舆观念

风水理论萌芽于汉代,盛行于宋代。在民居营建文化中,风水关乎人生的福祸吉凶,反映出的是古人与自然相亲和的环境观。阳宅风水特别讲究门的设置。因为门是住宅的气口,是内外进行交换的空间,所谓“阳宅首重大门者,以大门为气口也”。门的位置、朝向、择日等不仅影响到房屋的整体设计,还直接影响到主人的运势。

民居多为坐北朝南,大门开在东南角。进入大门后要向左拐,才能进入院落中。这便是风水上的“坎宅巽门”。也有少数院落的大门与房屋的朝向不是呈垂直角度,而是故意做成斜门,如成都文殊坊珠宝街27号民宅(图11)。由于其发音与“邪门”相似,而且又容易与邻近建筑物互相磕碰,因此为了避免带来麻烦,一般人家的大门要避免这种格局。但是,有些情况下却需要通过改开斜门改变格局。当有道路直冲大门的时候,改开斜门可以避免与尘土和噪音^{[7]516}。



图11 四川省成都文殊坊珠宝街27号民宅

风水不仅关系到大门的朝向,还涉及大门与整个院落的空间关系。阆中古城蒲家大院的“倒进门”便采用了不同一般院落的处理方式。蒲家大院位于阆中古城笔向街40号,是一座建于明朝末期的三进庭院,也是四川省唯一倒进门式风水院落古民居。大门背面临街,设长甬道,经二门、

三门进入花园,再倒进至正门,由此分别进入前、中、后三个庭院,当地人称这种设置方式为“倒朝门”。通过堂屋后的神壁道可进入后花园,另有朝南的侧门与大门相通。

2. 民间巫术信仰

门具有防卫功能,因而被赋予通神、驱鬼的意义,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仪式与习俗。这种原始信仰至今仍贯穿于现代人类的生活中。只是门的意义有所变化,由最初的驱邪魔,发展为助功利、降吉祥。无论其意义如何变化,与门有关的生活习俗与辟邪文化都是百姓纳善辟邪的态度的映射。

(1) 偶像化的门神。门神是镇鬼辟邪的保护神,多采用年画的形式贴于门板上。而阆中古民居的门神与其他地区的年画门神有所不同,是固定的大型装饰门画,其刻绘结合,永久固定,带有浓郁的原生性,是门神崇拜传统向世俗年画过渡表现的活化石^[8]。不同地区的人所信仰的门神也不尽相同,主要有文将(图12)、武将、祈福门神三类,文门神有天官、仙童、刘海金蟾等;武门神有秦琼、尉迟恭等;祈福门神即为福、禄、寿三星。



图12 文门神、武门神

(2) 厌胜镇物。当房屋格局不佳或有某种不利的“凶兆”时,就需要悬挂相应的器物化解危机。吞口、八卦(图13)等厌胜物多悬挂在门扇或门楣上,石敢当、石狮则多立于门前,钱财、宝瓶则放置于门下。据云南大理沙溪镇的风水师寸应星先生说,如果有两门相对或者两家房屋门对柱的情况时,需要在正脊中央放置独角兽(当地人称瓦猫)来抑制煞气。还有个别人家在门楣上悬挂铜钱、铃铛以求财源滚滚,反映了当地居民渴求富贵的心理。



图13 成都宽巷子20号的八卦

3. 立新门仪式

各地区的立门仪式略有差异。江苏地区安门时，要在门槛下方以及门楣的上方各放两枚“太平钱”，以示出入平安；苏州地区的工匠在立新门时要紧门缝，举行祭祀仪式，木匠们吟唱讼词，恭贺主家开门大吉；云南、贵州等地区还要举行踩门或开财门仪式。在云南大理周城，立新门时要在大门的门底石下藏“宝器”（图14），一般是一个8K银子或者小银元。主家要先备好香斋、香火、茶器、酒器，然后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或一对夫妻，为房屋主人踩大门。踩门人在踩门时，口中还要祝词：“门底石安下万年桩，把住大门安住家，吉日良辰安门底，杨家代代出英才，门底石块四四方，财源广进人平安。今日我把大门上，庆贺主人富贵荣华大发旺。”此时，主家给老人磕头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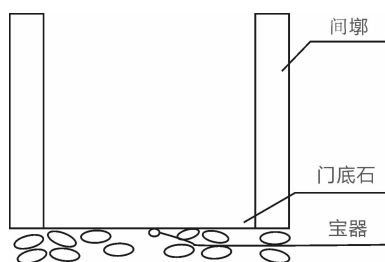


图14 云南省周城村的门下宝器安放位置示意图

四、实用构件的艺术化——传统民居门饰的文化转向

门上方的门簪、匾额、下方的门枕石、门前的拴马桩、门扇上的铺首、门锁、看叶，都是发端于门的实际功能和安全需要。这些构件的发展与使用，同工艺技术、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审美意识的反映。在历史的逻辑演进中，门的构件从实用功能向装饰功能转化，从而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1. 精雕细刻的门枕石

门枕石是“在大门门轴下面起承托大门和门轴转动作用的石构件”^{[9]216}，古代称为“门当”，北方俗称“门墩”、南方俗称“砢石”。分内外两部分，位于门扇内侧的部分为承重构件，上面有一凹穴，可承托门轴转动；位于门扇外侧的部分为平衡构件，其作用是使内侧部分保持稳固，防止开门闭户时门扇前后晃动，故体积大于内侧部分。两部分中间为凹槽，用于安置门槛。在古代，普通百姓人家门前不能设立石狮，故外部门枕石成为重点装饰部位，其尺寸逐渐扩大，远远超过门枕石所需要的实际高度，装饰也日趋华丽，并演化出方形、圆形、瓶形等各种样式，从而形成独特的门扉艺术——抱鼓石（图15）。



图15 门枕石类型

2. 形态各异的门簪

门簪最初为固定连榫（承受门扇上轴的横木）和中榫的连接构件，横插在门的上部，似古代妇女的发簪，因而得名。其结构为一对长木栓，前端粗大，后部细长。而后，露在外部的部分逐渐变为装饰性构件，演化出圆形、半圆形、方型、六边型、八边型、梯型、心型、佛手、莲叶等，其形态各异，有曲有直、可圆可方（图16）。门簪多为两枚，上面有雕刻饰彩的图案或文字，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吉祥图案以花卉、动物、万字纹为主；文字以“福”、“禄”、“寿”或“吉祥”、“如意”居多。有的将“福”字倒写，以示“福到了”。

3. 驱邪镇鬼的铺首

为方便开门、叩门，门扇左右两侧各装有一个金属把手，称为“门环”，多为铜制，也有铁制者。古时的门环多为圆形，也有少数菱形、令箭



图 16 门簪类型

形、树叶形门坠。门环与门扇之间用“门钹”相连,其形状有圆形、兽面形、如意形、蝙蝠形、葫芦形、寿字形、喜字形、多边形、佛手形等,直径约为十几厘米。其中,兽面形的门钹称为“铺首”。凶猛的兽头口中衔有圆形的门环,又称“铺首衔环”(图 17)。

传统宅院大门多以螺的形象做铺首。据《百家书》记载,鲁班见螺有外壳,遇到不利情况,便缩入壳内以保安全,于是将螺制成铺首安置在门上,以示除灾避难、驱鬼辟邪。如今,民居宅门上的铺首还有虎、狮、螭等兽头状铺首,怒目圆瞪,露齿衔环,



图 17 铺首类型

4. 旌表德行的匾额

匾额一般悬挂于檐下,有木刻、石刻、灰制等制作工艺,是集书法、雕刻于一身的门饰艺术。用以表达思想感情之类的属于匾,而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之类的则属于额。

外乎“修身、齐家”。文字的表现形式有阴刻、阳刻或贴金刷色,字体也丰富多彩,真草隶篆兼容并包。较为讲究的匾额还在边框上雕饰各种龙凤、花卉图案,作金漆彩画,极尽华丽之能事。



图 18 匾额类型

匾额宽度比大门略宽,主要以黑色、暗红色为底,匾上铭字涂以金色,边框饰以花纹(图 18)。也有以蓝色为底,文字为白色的匾额。字体随主人的喜好而定。两字门匾有“煦风”、“贻勤”、“笃诚”、“敦睦”等;三字门匾有“勤为本”、“康而寿”、“怀和气”、“绳其德”等;四字门匾有“海纳百川”、“四世同堂”、“奇谋睿智”、“钟灵毓秀”等。其内容无

五、结 语

民居之门虽不如宫室之门精致华丽,却表现出很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借助于文化地理学研究传统民居门饰,不仅可以发现门饰在空间上的差异,也可以发现其在时间上的演变。从空间上来说,不同地区的门在造型、材质、装饰、色彩等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性特征,其背后伦理、习俗、风水观念却是集体文化意识的反映;从时间上来说,传统民居门饰的功能与作用也发生着演变,其实用功能逐渐转向审美功能。可以说,民居门饰文化,是个性与共性、地域性与集体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共存。

参 考 文 献

- [1] 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 楼庆西.千门万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3] 王其钧.古雅门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4] 张良皋.老门楼[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 [5] 曾宇.川渝地区民居营造技术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6.
- [6] 魏晓芳.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3.
- [7] 董易奇.黄帝宅经全书典藏精品版[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 [8] 李东风.阆中木板彩绘门神的人类学考察[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8(4):30-33.
- [9] 谢玉明.中国传统建筑细部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A 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Door Ornament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Geography

LI Chao, XIE Ya-ping

(School of Desig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door,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building, not only displays the physical form such as shape, color, decoration and others, but also reflects the cultural ideas like folkways, beliefs, fengshui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geography,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door ornament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landscape culture. With the field research on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Jinzhong area, Huizhou area and Southwest of China, it explore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or ornaments in these traditional houses and analyze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ornaments with dynamite feat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culture.

Key words: door ornaments; tradition; dwelling; culture

【编辑 高婉炯】